

20世纪30年代江苏农村经济的衰败

杨红运

(天津外国语大学 涉外法政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 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商品倾销,水旱灾害的打击,土地分配不合理,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苛捐杂税的压力,引起了江苏农村经济的衰败。其主要表现是农作物收成暗淡,农村副业的衰落,农民离村人口增加,耕地大量荒芜,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的衰败加深了农村贫困化的趋势,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隔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也促使江苏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干预。

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 江苏农村; 农村经济; 衰败期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4)01-0148-09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动,中国农村经济出现大萧条的景象,这对建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此次农业危机于1931年突然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即使在向来富庶的江苏农村,也陷入了“奄奄一息”和“濒于待毙”的境地^[1]。本文拟从国民党统治核心区的江苏省为中心,考察当时农村经济萧条的原因、表现形态及影响,以另一个视角透视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演变,就教于方家。

一、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原因

考察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原因,可以从国际和国内方面来讨论。从国际因素来看,主要体现为世界经济危机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商品倾销。从国内因素来看,主要体现为水旱灾害的破坏,土地分配不合理,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苛捐杂税的压力。

(一) 各主要资本主义对华的商品倾销

1921年至1931年,当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中国因自身银元贬值,出口数量尚能保持增长势头。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的丧失,帝国主义各国为了转嫁危机,加大了对华商品倾销,致使中国出口骤降,进口剧增,仅1933—1934年两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额达12.29亿元^[2]⁴¹²。白银大量外流,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1931—1933年期间,米价跌落45%,茶价跌落58%,茧价跌落57%,花生价跌落60%^[3]。1934年农产品价格达到了最低点。

江苏和全国一样,也深受外国商品倾销之影响,农产品无法运销国外,民族工商业受到备受打击。据时人的调查显示,1930—1935年间,江苏商店营业状况占平常年的比例从78%降到了51%,即近一半商店无法恢复正常营业^[4]。又如民族工业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仅1935年一年,江苏22家纱厂中,便有6家工厂停工,3家工厂减工,纱锭生产减少了26.7%^[5]²²⁶。江北各县遭遇水

收稿日期: 2013-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XDJ00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S037)

作者简介: 杨红运(1984—),男,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E-mail: hawk027@126.com

灾,洋米输入减少,但米价并没上涨,因为各海关的洋麦面粉进口却增加了10倍。“洋麦价格较本麦低廉,厂商亦乐于取用,故近年沪锡厂商亦告绝迹。”^{[2]619}1932年,江苏本为丰收年,米市反而不景气,因为洋米进口增多,谷价猛跌,江北产米之区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兴等地粮行中,新稻堆积如山,仍无主顾。新麦每石售价仅3元,要比1931年低了4元。米价每石7元,要比1931年低了六、七元。盐城顶好白米,每石售价才5元,农民极为窘困,缺乏现款,购买油盐,不得已用稻谷交换^{[2]417}。而农产品以外价格大多不变,农民无法收回成本,入不敷出,生活濒临绝境。

(二) 水旱灾害的破坏

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灾,江苏省是受灾严重的省份之一。进入6月,江苏全省一直被风雨所笼罩着,江、淮、沐、泗等水系均有大涨,淮北、淮南成了一片泽国,太湖流域也发生了大面积水灾。在六合,三分之二以上地区被洪水淹没,房屋被毁坏1万余间,灾民达10万余户。海门、南通、江都、镇江和如皋等县,县城大量积水。江阴等地,颗粒无收。8月,淮河暴涨,运河东西堤决口不下40处。江都的邵伯镇,数千百姓被洪水淹死。随后,高邮、兴化、东台、盐城、阜宁、淮安等地也被水淹。据当局对此此次受灾情况的统计,江苏省有近三分之二的县份全境受灾,连同部分受灾县份,全省受灾面积达到了85%以上,灾民达654万人,死亡人数为2.33万人,财产损失达到了2.89亿元^{[6]378-379}。1934年,江南的32个县于入夏以后遭遇了60年来罕见的旱灾。数月无雨,河道搁浅,水井枯竭,田地龟裂,受灾田地达2000万亩,仅粮食损失就达10亿公斤^{[7]869}。灾后,饥民们扶老携幼,向其他地方乞食。他们用糠批、野菜、草根、金刚藤等来充饥,甚至还以风化石填充饥饿的肚子。逃亡在外的饥民以一、二十元不等价把子女卖给别人。有时,在买主很少的情况下,有的灾民竟绝望地杀害了他们的子女^[8]。

(三) 土地分配不合理。江苏是资本主义成分浓厚的地区,但农村土地占有关系仍然比较落后,田权不均造成了土地使用权的饥荒与劳动力的浪费,阻碍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据《江苏省鉴》记载,三十年代江苏有农田8001万余亩,“每农户占10亩有强,每户每人所得田不过一二亩而已。”^{[9]17}据1933年实业部调查,江苏农户中,耕种土地未满10亩者占51%,耕种10~20亩者占28.5%,耕种30~50亩者占12.55%,耕种50~100亩占5.9%,耕种百亩以上的占2.1%^{[10]353}。据时人对江苏28个农村调查表明,邳县6村中,占总户数4.7%的地主和富农占地面积达41.4%,盐城7村中,占总户数22.5%的地主和富农占地面积为62.6%,启东8村中,占总户数7.7%的地主和富农占地77.6%,常熟7村中,占总户数2.3%的地主和富农占地59.5%^{[11]7-11}。无锡3个村121户农村经营调查发现,占总户数12.4%的地主和富农,占田亩总面积77.5%,总户数87.6%的中农和佃雇农占地仅22.5%^[12]。地权畸形可见一斑。

大多数贫雇农严重缺乏土地,患有土地饥荒,他们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着地主的地租剥削。这一时期的地租有分租、谷租和钱租,地租率普遍较高。钱租占地价在8.1%~8.2%;谷租占产值的44.3%~49.9%;而分租占产量43.4%~46.7%^{[2]247}。“农民为地主终年劳动,血汗精力所换结晶,仍多数贡献于地主。这样佃农无异于为地主之牛马奴隶,而地主仅有土地,即可不劳而获种种利益。”^[13]高额的地租夺去农民的全部剩余,造成农民生产资金不足,降低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反过来影响了农业收成。

(四)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

虽然近代农业的品种改良、化学肥料和农业机器也曾出现,因大量劳动力的存在,新式农具价格昂贵,农民仍多使用千百年传下来的旧式农具,农业技术改良更多在试验场和学校中,无法真正走进农村中去^{[11]16}。劳动力农民所依赖传统耕作工具和耕作方法,农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质的提

高。即使落后的耕作农具,也并非每个农家能购买得起。如镇江附近 900 余农家,只有 90 余头耕牛,平均 10 户才拥有一头耕牛。徐州八里屯村平均 3 户使用一头牛,2 户合用一头骡,9 户使用一件犁耙^{[2]859-861}。在缺乏耕畜的地方,人力代替畜力的现象并不鲜见。

至于肥料,因资金困难,江苏省使用化肥的农家只占 3.1%^[14],农民多以来人畜之粪,很少使用豆饼和草木灰。为了积肥,一些靠近城镇的地方厕所林立,“每街约有数个,且建筑美观,打扫清洁,亦广招徕之意耳,闻乡镇中之厕所颇不亚于城市,即可知其重视肥料也。”^{[15]5312}由于一些农民缺乏化学常识,管理储藏办法失当,堆肥听任太阳曝晒,风吹雨淋,致使肥力分散,影响了农业的收成。

(五) 苛捐杂税的压力

民国以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等直接倾压到广大农民身上。尤其是田赋征派,自清朝灭亡后,成为了地方军政当局的囊中物。国民党政权将其划为地方财政后,各地对于田赋和附加税的追逐,令清王朝也望尘莫及^{[16]338}。以江苏为例,该省田赋税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如下表所示。

表1 江苏省田赋占地价之百分率统计表^[1]

单位: %

年别	田类		
	水田	平原高地	山坡旱地
1911	1.39	1.57	2.00
1931	1.52	1.52	1.95
1932	1.89	1.77	2.49
1933	3.11	2.40	3.13

从上表可见,1912—1933 年间,田赋增加了半倍以上。据陈灿生的调查,1912—1928 年间,江苏的田赋税率增加了 1.39 倍。1928 年后,田赋正税增加率更为明显。以无锡而论,1932 年的田赋税率比 1928 年的增长了 1.26 倍^[17]。尽管国民政府计划田赋征收应是地价的 1%,事实上,江苏 61 县中,有 50 县的田赋都超过了这个比例,其中东海县田赋占地价的比例甚至达到了 3.5%。田赋税率增加了,但江苏省政府的田赋收入并未随之增加。除了农村经济衰败的因素外,各地在田赋征收中的舞弊和隐匿,造成了严重的积欠。仅 1927—1931 年间,各地积欠已超过 700 万元。当局为此不得不再催征,直到 1934 年 5 月,才追回旧赋 100 万元^{[10]285-288}。与正税相比,田赋附税的增加更为惊人。江南地区土地肥沃,田赋附加一般不超过正税的二三倍,但其田赋正税较重。江北地区因土地贫瘠,正税较轻,其附税却超过正税八倍或十倍,甚至有十五六倍以至二十五六倍的。田赋附加的名目,多以教育、公安、自治、党务和建设等名目摊派^{[11]62-64}。截止 1936 年,江苏省宣布已废除的苛捐杂税为 633 种,合计 124 万余元^{[10]296},已废除的捐税种类尚且如此之多,可以想象当时存在的赋税是多么惊人了。无怪乎曾主编过《江苏省鉴》的赵如珩毫不讳言地指出“江苏赋税之繁杂,吾人固无庸讳言。人民对于附税之感受痛苦,亦以附税为最甚。”^{[9]12}可以肯定的是,繁重的苛捐杂税,消耗了农民终岁所得,扼杀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

二、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表现

从 1931 年农业大萧条以后的数年间,出现了非常惨烈的状况,其表现形态如下。

(一) 农作物收成暗淡

江苏地处江淮平原,山地较少;跨江滨海,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于耕种和灌溉,具备农业发展的优越条件。据 20 世纪 30 年代,江苏粮食作物产量占全国的 11% 左右,油料作物产量占全国 9% 左右,棉花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左右^[18]。20 世纪 30 年代,江苏农作物收获量普遍不高,始终没有达到十足年成的水平,如下表所示。

表2 1931—1937年江苏省主要作物收成比较表 (以全丰收年为100)

年份	小麦	大麦	粳稻	糯稻	棉花	玉米	高粱	甘薯	豌豆	蚕豆	大豆	燕麦	油菜籽	花生	芝麻
1931	77	74	56	—	51	72	60	63	—	—	63	—	67	—	—
1932	74	73	82	—	64	82	66	80	—	—	79	—	66	—	—
1933	71	68	76	64	65	56	63	71	53	61	71	70	66	75	73
1934	75	74	56	52	61	54	61	52	66	66	40	73	66	61	59
1935	66	72	73	70	61	69	75	87	65	72	53	59	72	59	63
1936	69	66	78	77	63	76	78	71	62	67	71	68	65	66	70
1937	67	61	74	75	63	74	74	86	61	61	75	66	64	74	60

资料来源: 根据《农情报告》3卷8期第179页、3卷9期第165页、4卷1期第2页、4卷9期第224页、4卷12期第324页、5卷8期第255页、6卷2期第25页相关部分制成。

由上可见, 1931—1937年, 江苏省各种农作物收获量基本上六成左右, 这意味着收获量平均减少四成左右。有的作物明显甚至歉收, 如1931年粳稻收只达到56%, 棉花收成达到51%, 1934年的大豆收成仅为40%。即使丰收的1932年, 粳稻亩产只有420市斤, 玉米亩产不过253市斤。1931年是小麦的最好收成, 其亩产收成也不过193市斤^[19]。据1937年关于乡村人民平常年粮食消费的调查, 有24个县的稻谷生产仅达到消费需求的50%, 6个县的小麦生产仅达到消费需求的53%^[20]。农作物亩产量的低下, 无疑导致农民生活的艰难。

(二) 农村副业的衰落

在江北, 向来以棉花出产为大宗的通海一带, 因销路日渐恐慌, 农民只能以麦稻和杂粮的栽培作为农家收入的唯一源泉^[21]。在江南, 由于外来洋布的倾销, 丝跌茧廉, 丝价从80元/担跌落到16元/担。因此, 农民副业陷入绝路, “以江阴而论, 七八年前, 全县蚕季收入, 年约250~260万元。近年不满50万元。过去布疋收入畅销于外, 织工日以继夜, 今则外销呆滞, 存货堆积, 机杼停而厂门关, 时有所闻。”^[22]在常熟, 农妇每日的织布收入仅为30年代以前的四分之一, 她们不得不靠出外雇佣为生^{[2]792}。甚至在一些地方, 茧价跌落, 使得农民对桑蚕失去了兴趣。如在无锡, 农民听任桑树自然生长, 并不加以培植, 致使田地日益贫瘠, 荒芜满目。桑树长不到一尺, 产量自然减少。又加上桑叶价格极低, 农民见无利可图, 相率锄桑植稻。在丹阳的东南乡, 曾经蚕户占到半数。然而, 进入30年代, 人们已很难找到养蚕的人家^[23]。在武进, 农民对于蚕桑除了叹息, 再也没有表达苦闷的途径。蚕桑失败之后, 他们相率改桑田为稻田, “家家这样改变计划去做, 好像谁下了总动员令似的, 任凭政府怎样的劝导提倡, 竭力改善, 他们是置之不理, 像是前途决无希望, 命里注定他们落难。”^{[2]752}

除了洋布之外, 其他农村副业也在外货的冲击之下, 显得每况愈下。据当时的农村调查, 30年代以前, 苏锡常一带的刺绣业较为兴盛, 每家约一二人从事此业, 每年可获30元。30年代后, 由于销路停滞, 价格下跌, 大半农家只得放弃这种副业。同期毛毡业的收入, 尚不及最盛时的五分之一^{[24]33023-33024}。以出产大蒜闻名的启东, 东北沦陷后, 该县大蒜销路受到限制, 每年损失达20万元^{[24]9}。又如素负盛名的武进梳篦业, 因外国染织厂吸纳了大量资金, 梳篦业的金融周转困难, 致使该行业一落千丈^{[10]454}。在苏州, 农民们曾以编蓑衣、剖灯草和做荷包等副业维持生计。30年代后, 灯草、荷包、草席等手工业, 因竞争而自然淘汰了。“至于蓑衣、芦席的销路也一落千丈。如是农民用以辅助耕田不足生活的副业, 全被时代的巨浪将它吞没, 只好靠着农产品从不等价交换中, 换取其他日用品, 受着都市商人的剥削。”^{[25]56885}在南通, 洋网业曾经年收入达20万元, 当地十有八七的妇女曾从事织洋网, “近因洋网滞销, 价格低廉, 农民收入亦随之减少矣。”^{[26] (P57386)}当时, 无锡

的一位教师感慨道“洋火、煤油、样布、肥皂、手巾、洋袜,这些哪一样不是外国货,哪一样不是叫老百姓出钱的?从前老百姓自己家里制造主来的土碱、土布、豆油没人买了。”^{[2]790}

(三) 农民离村人口增加,耕地大量荒芜

江苏本为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资本主义过程要比其他地区更为迅速。然而,由于耕作落后,社会生产力低下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离村农民日增,“即证之一火车站,来往乘客,每往都市之客人多于下乡者,故荒地面积,大有日增一日之趋势。”^{[9]23} 据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江苏省农民离村率占4.3%,有些村庄的离村率甚至超过了20%。其中,青年男女离村的比率为11.2%,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就离村原因而言,除去天灾人祸以及人口压力外,经济压力因素占到了44.2%^{[2]886-896}。时人农村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在江都,“自1931年后,粮价低落,佃农多有离村现象,以赴上海作工者最多,南京镇江次之。”^{[27]53307} 在盐城,“农人终岁劳苦所得,除了纳租和自担负捐税外,最低生活还不能维持,只好弃田跑往江南去。”^{[11]89} 在淮安,“佃农只有走入离村之途,纯良者还赴江南各地,实做雇佣劳动,如上海至码头工人,纺织工人,南京之黄包车夫,各地之女佣,淮安人都占很巨大数字。”^[28]

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村,耕田无人照顾,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4个县的调查发现,与1928—1929年耕地面积相比,1933—1934年这些县份耕地面积下降了5.76%^{[2]908}。与此同时,全省荒地面积有增加的趋势。内政部所制的1914—1933年间江苏省荒地比较表,便可说明这一点。

表3 江苏历年荒地面积比较表

单位:亩

年份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年	1933年
面积	2557827	2429827	2336284	2331591	2500796	2365802	2340036	53380673

资料来源:徐思予《江苏荒地概况之探究》,《江苏月报》1935年第3卷第6期。

由上可见,与1914年相比,1933年江苏省荒地面积增加了20倍有余。就江苏省内而言,江北荒地又多于江南,荒地面积增加趋势更为惊人。如1918年徐州及海州荒地面积仅为10700亩,到了1932年达到了15614218亩,几乎增加了142倍有余^{[29]47489-47490}。荒地面积如此剧增,正说明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四) 农村金融枯竭

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农村经营的命脉。农民所需的肥料、种子和农具农忙时节所需的家畜和农业劳动雇佣,无不需现金。由于农产品对外输出锐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农村现金不断外流,江苏靠近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物价波动所受影响远比其他各省大。就从农村而言,地主富户迁居城市,或享受城市生活,或投资工商业。正因如此,据农复会调查者的观察,他们几乎看不到地主的身影。在其调查的952户中,只有7户地主,且多为小地主,中等地主以上的人家绝少居住在乡村^{[11]7}。显然,都市从农村抽走了大多数资金,加剧了农村金融枯竭。江苏各县虽设有农民银行,但无法深入内地,赤贫农民无法借款。根据1933年各省农村借贷调查显示,江苏农村中,62%的农户需要借款度日,其借贷来源主要来自富农、钱局、亲友和地主,平均年利率为3.5%^[30]。其他乡村调查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如1933年徐州民众教育馆对铜山县八里屯村的调查发现,该村150户中,负债的有112家,占到总数74.6%,平均每户欠债在100元以上^{[31]890}。又如1935年,上海俞塘民众教育馆对附近215户农家调查显示,收不抵支的农户有190户,占总数的88.3%,其中55户负债超过100~150元^{[32]1073}。

在青黄不接之时,或遇到疾病或婚丧意外,农民需要资金迫切,只好诉诸高利贷,忍受高利贷的盘剥。高利贷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南通一带,借银1元3个月内需要还价值四五元的棉籽;

昆山乡间借银10元,一年之内的利息是5斗谷;武进一带借米1石,需要还谷2石;吴江一带盛行“念个头”借银20元,需要还息1元。还有放“印子钱”,利息每月一二角。“此种情形虽特殊,但于乡村民间,比比皆有。农民之痛苦,莫甚于此。”^{[9]45}

从上述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表现形态上看,其衰败范围之广泛,衰败程度之严重,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影响

中国向来“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经济的兴衰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方面息息相关。为此,有必要讨论一下江苏农村经济衰败的影响。

(一) 加深了农村社会的贫困化趋势

农村社会的贫困化趋势之一便是乡村各阶层的自耕农日益减少,贫穷佃农的增加。据时人的估计:自从1912年至1933年的20余年间,江苏的佃农所占农户的比例从31%上升到37%。自耕农所占的比例从45%降为37%^[33]。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也展示了这种变动,据调查者的观察,“农村中衰落的情形,已到一种无可掩饰的程度。走遍这28个村子,绝少有若干新兴的气象。”1928—1933年间,盐城的28户富农,有4家沦为中农;59户中农,有2户降为贫农。启东的变化更为明显,33家富农,有3家富农降为中农,甚至3家跌落为贫农。五分之一的中农降为贫农^{[11]7}。在启东,1928—1936年间,自1928年至1936年间,富农所占的比例从9.4%降到6%,中农所占的比例则从36.3%降到了27%,贫农从50.8%上升到63%^{[34]661},足见富农阶层的没落和贫农阶层扩大的现象。在常熟,同样有五分之一的中农落入贫农。调查者感慨道:“五年中,江苏农村中不论江南江北都充满着衰败的景象,贫农的数量在一年年增加,家家都追想着以前的盛况。中农的摇落已显著的很,令人触目惊心的便是江北富农的衰落,这一批成为经营中最有希望的分子,不但没有发展的前途,还不能保持原有的地位。”^{[11]17-19}另一位调查者对嘉定农村的观察也有类似感触,因为外货充斥,土货滞销,曾经的富裕之家,变成了中产之家,曾经的中产之家,跌落为中下之家;曾经的中下之家,仅能免于冻饿而已。“至于大多数之贫农,终岁辛苦,犹不能获一饱,亦食殆不继,皆是以稻作物换得之金钱,不得不行高利贷。故一般农民均衣破旧不堪之衣服,住简陋之草房,甚且盘糙米而无之,甚至有食麦麸。”^{[35]55066}

在苏北,在兵灾匪患和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不少农民秋后就举家外流,或到海滩拾柴割草,或到阜宁一带以捡山芋萝卜为生,或把本应当作肥料的豆饼煮熟后充饥。饥饿的农民,或沦为乞丐,或流向江南的都市。他们在江南从事着小贩、厂工、黄包车等在当地人看来是下贱的职业。有的农户在江南充当了乡村的雇工,他们为当地开垦荒田,住着一二间与清秀丰腴田野不大相衬的草棚^{[36]361}。江苏多数的贫农只能吃稀粥,一部分贫农还用糠皮和菱头煮饭。“启东的农民,十八九家并无食粮,只有用苜蓿野菜充饥,大都鸠形鹄面,营养不足,他们这种惨苦情形,实难笔墨所形容。”^[17]在苏南,农户们的生活相对要好一些,但也仅是维持温饱而已。当时诸多农村调查,展示了农户们不容乐观的生活状况。在无锡,一个拥有10.6亩的自耕农家庭,种植粳稻,每年仅能盈余32.32元。多数佃雇农交完租税后,很难熬过年关^{[9]12}。向来富庶的苏南吴县,乡村经济的萧条情形在一位返乡者的笔下跃然浮现:“原先七八十元的黄牛只能卖二十多元,村上挂着的卤肉卤鸡没有了,连年的茧子卖不出钱,只好把桑树砍掉。这个村子还属于有一点粥可吃,横泾的一些乡村荒得连年时,人们只好以煮烂的豆饼和草根为食。”^{[37]87}在宝山,时人对彭浦、江湾和吴淞等较为富庶乡镇6410户农民生活作了调查,难度温饱的农户也占到了41.15%^{[38]979}。向来富庶的江南农村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想而知了。

(二) 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隔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

农民生存状况的恶化,引起了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加深了农民对政府的隔膜。当时,一位名叫张德先的调查者不得不承认“国民革命告成以来,人民对于政府之信赖,并不较过去为强。盖为政者,口头之善政太多,实施之良治太少,人民所要求解除之痛苦,迄未见自所解除。盖以数年来,农村凋敝达于极点,而农民之租税负担反致有加无已。”^{[39]14501}“年来农民对政府措施已成惊弓之鸟,凡政所派之调查员概不信任,闻于土地一项尤讳莫如深,不以真像见告。”^{[40]55625-55626}另一位在江都乡村从事调查的吴致华,也发出了类似的感触。他在日记里写道,“历来政府只知榨取农村,致农民有草木皆兵感觉使然。”由于政府并没有给农民提供有形的利益,农民只有缴纳钱粮的义务,他们认为政府是“不啻一万恶之魔鬼也”,连吴本人也引起了农民的反感^{[27]53288}。在吴县从事土地调查的魏译之,无疑印证了张、吴的看法。当魏向农户询问缴租情形时,一位农民告诉魏“你们是政府派来的查抗租的。”无论魏再怎么追问,这位农民或者不答,或者借口不清楚,魏只能“怅然的归来”^{[25]56872}。从这些调查材料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低下。

甚至生存状况恶化引起的抢粮风潮,成了灾民们为争取生存而采取的一种最原始的反抗,它常带有浓厚的“剥夺剥夺者”的进攻意味^{[16]265}。如1931年水灾之后的泰县,数千难民聚集在观南寺李氏宗祠和陆陈公所,嗷嗷待哺^{[41]26}。在常熟,由于当局漠视赈灾和免租,数千灾民向区公所抗议。他们与警队发生了冲突,致使2人死亡,10余人被逮捕^{[42]21}。1932年春天,饥荒变得更为严重,农民与地主的冲突接连发生。在涟水,在一位革命者的领导下,饥饿的农民强行打开了一位地主的仓库,分掉了这位地主家30多芭元麦,4石多芝麻,30多石秋豆。同年2月,溧阳前马村500余户农民为度过灾荒,集体向公堂请求借贷。在遭到了族长拒绝的情况下,愤怒的农民采取了抢米和吃大户的行动,他们将土豪劣绅捆绑起来游街。这次斗争迅速波及全县,持续了半年之久^{[43]19}。同年5月11日~6月10日间,仅无锡一县因饥饿发生的抢米风潮,就不下25起^{[2]1029}。到了12月份,海门的饥民们还自发组织了“共吃团”,集体到附近地主家中吃饭分粮^{[44]23}。1934年旱灾之后,7—8月间,金坛、松江枫泾、江浦桥林镇以及吴江震泽镇、宜兴新芳桥等地,频繁地发生了数起灾民抢米事件,人数少有数十人,多达数千人^{[45]698}。正是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地主们的恐慌。国民党的报纸惊呼“若不急为救济,则地方治安不堪设想”^{[46]21}。

(三) 农村经济的衰败,促使江苏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干预

水旱灾害频频发生,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的动荡,社会上掀起一股“复兴农村经济”的呼声,国民党当局也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在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经济的改革。首先,调剂农村金融。江苏省整顿农民银行,使其代理省县金库,重要乡镇设立分行或办事处,将其资金用于辅助农民生产和运销。1936年,江苏银行和农民银行可用存款已达4000余万元。还在农产品集中地区设立农业仓库,配合农行机构,调节粮食供需,平衡粮价,避免谷贱伤农。抗战爆发初,江苏已设立300余所农业仓库^{[47]66}。其次,减轻农民负担。江苏省建立了省县预算制度,整顿田赋营业等税,剔除中饱,取消了数十种苛捐杂税;针对地权畸形、田赋不均的状况,江苏省举办土地陈报,各县清查出了大量隐匿的土地,少的有万余亩,多的达110万亩。在土地陈报的基础上,国家重新修订税则,田赋较为公平地从更多的田亩上征收,农民负担因而有所减轻^{[48]35}。江苏省还利用保甲组织推进农作合作社,到1937年初,江苏省合作社有1870多个,社员7.9万人,社股81.4万元^{[47]63}。再者,推广农业改良,兴修水利。为了加强农村抵御灾害的能力,江苏省进行了兴修水利工程。如苏北导淮入海,海州疏浚沂沭尾间各河道,盐城疏浚了里下河通海水道,兴建了通海泄水道;镇江、无锡、宜兴和丹阳等县运河段的整理,镇江和江阴之间沿江水闸的修建等。其中,1934—1937年导淮入海,征工人数最多时达24万,出土

6200 万多公方^{[47]55}。在江苏省征工浚河动员之下,农民增强了水利灌溉的意识,开始自动挖掘田亩间的沟渠,防备旱涝。江北匪患平定后,农村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35 年秋,徐海一带农村出现了二麦丰收的状况^[49]。此外,江苏省政府还对稻、麦和棉花等农作物进行育种和推广,提倡防治病虫害和发展农村副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总之,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商品倾销,土地分配不合理,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水旱灾害的打击以及苛捐杂税的压力,引起了江苏农村经济的衰败。其主要表现是农作物收成暗淡,农村副业的衰落,农民离村人口增加,耕地大量荒芜,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的衰败加深了农村贫困化的趋势,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隔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也促使江苏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经济干预。

参考文献:

- [1] 曾济宽. 发展苏省农业刍议[J]. 江苏月报,1935,3(5).
- [2]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M]. 北京:三联书店,1957.
- [3] 黄光祖. 中国农村经济之崩溃与挽救[J]. 江苏月报,1935,3(3).
- [4] 近六年来商店营业状况占平常年之百分率[J]. 农情报告,1937,5(7).
- [5]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M]. 北京:三联书店,1961.
- [6] 魏宏运. 民国史纪事本末(第三册)(上)[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 [7]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苏省志·民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 [8] 溧阳十县查赈详记[N]. 申报,1935-03-06.
- [9] 赵如珩. 江苏省鉴·社会[M]. 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
- [10] 王培棠. 江苏省乡土志[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1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江苏省农村调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12] 韦健雄. 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J]. 中国农村,1935,1(9).
- [13] 虞永江. 沐阳农村鸟瞰(下)[J]. 淮海,1935,1(5).
- [14] 肥料及农业器械类[J]. 农情报告,1936,4(8).
- [15] 何新铭. 盐城实习调查日记[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01 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 [16] 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7] 陈灿生. 中国农村崩溃与挽救[J]. 江苏月报,1935,4(4).
- [18] 唐文起. 三十年代江苏农业经济发展浅析[J]. 中国农史,1983,1(1).
- [19] 近四年各省主要作物之每市亩产量修正[J]. 农情报告,1935,3(8).
- [20] 我国乡村人民常年食粮消费概况[J]. 农情报告,1937,5(7).
- [21] 江北农村的副业[J]. 江苏月报,1935,4(1).
- [22] 江南之中落与复兴[J]. 江苏月报,1935,4(1).
- [23] 江苏省蚕桑改良区二十三年度事业计划书[J]. 江苏建设,1935,2(2).
- [24] 何梦雷. 苏州无锡常熟三县佃租制度调查[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3 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 [25] 魏译之. 江苏山西实习调查报告[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07 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 [26] 张惠群. 江苏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08 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 [27] 吴致华. 江都实习调查日[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10 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 [28] 许叔彪. 淮安农村概况[J]. 淮海,1935,1(1).

- [29] 刘承章. 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7.
- [30] 各省农民借贷调查[J]. 农情报告, 1934 2(4).
- [31] 江苏省铜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铜山县志[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32] 上海市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县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33] 朱福成. 解决中国今日土地问题之途径[J]. 江苏月报, 1935 4(2).
- [34]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册)[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 [35] 徐洪奎、沈时可. 嘉定县土地局实习总报告日[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4辑.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7.
- [36] 冯和法.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M]. 上海: 黎明书局, 1935.
- [37] 中国经济研究会. 中国农村描写[M]. 上海: 新知书店, 1936.
- [38] 朱保和. 上海市宝山县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39] 张德先. 江苏省土地查报与田赋整理[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9辑.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7.
- [40] 张德先. 溧阳实习调查日记[M]//萧铮,主编. 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5辑.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7.
- [41] 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泰县志[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42] 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常熟市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43] 溧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溧阳县志[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 [44] 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海门县志[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45]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档案馆. 江苏革命斗争纪略[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87.
- [46] 启东县志编纂委员会. 启东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47] 陈果夫. 苏政回忆[M]. 台北: 正中书局, 1951.
- [48] 陈果夫. 江苏省政述要·财政篇[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3.
- [49] 苏北农村经济状况转佳[J]. 农村经济, 1935 2(10).

The Decline of Rur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1930s

YANG Hong-yun

(School of Law and Polical Scienc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the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towards China's commodity dumping, 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s, unreasonable land allocation, low level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xorbitant tax levies pressure,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which embodied the bleak harvest crops, the decline of rural sideline,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farmers leave the village, a large number of barren land, and the exhaustion of rural finance. The decline of the rural economy deepened the rural poverty trends, exacerbated the diaphragm between the farmers and the government, caused a violent social unrest, which also promoted Jiang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step up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1930s; rural of Jiangsu Province; rural economy; decline period